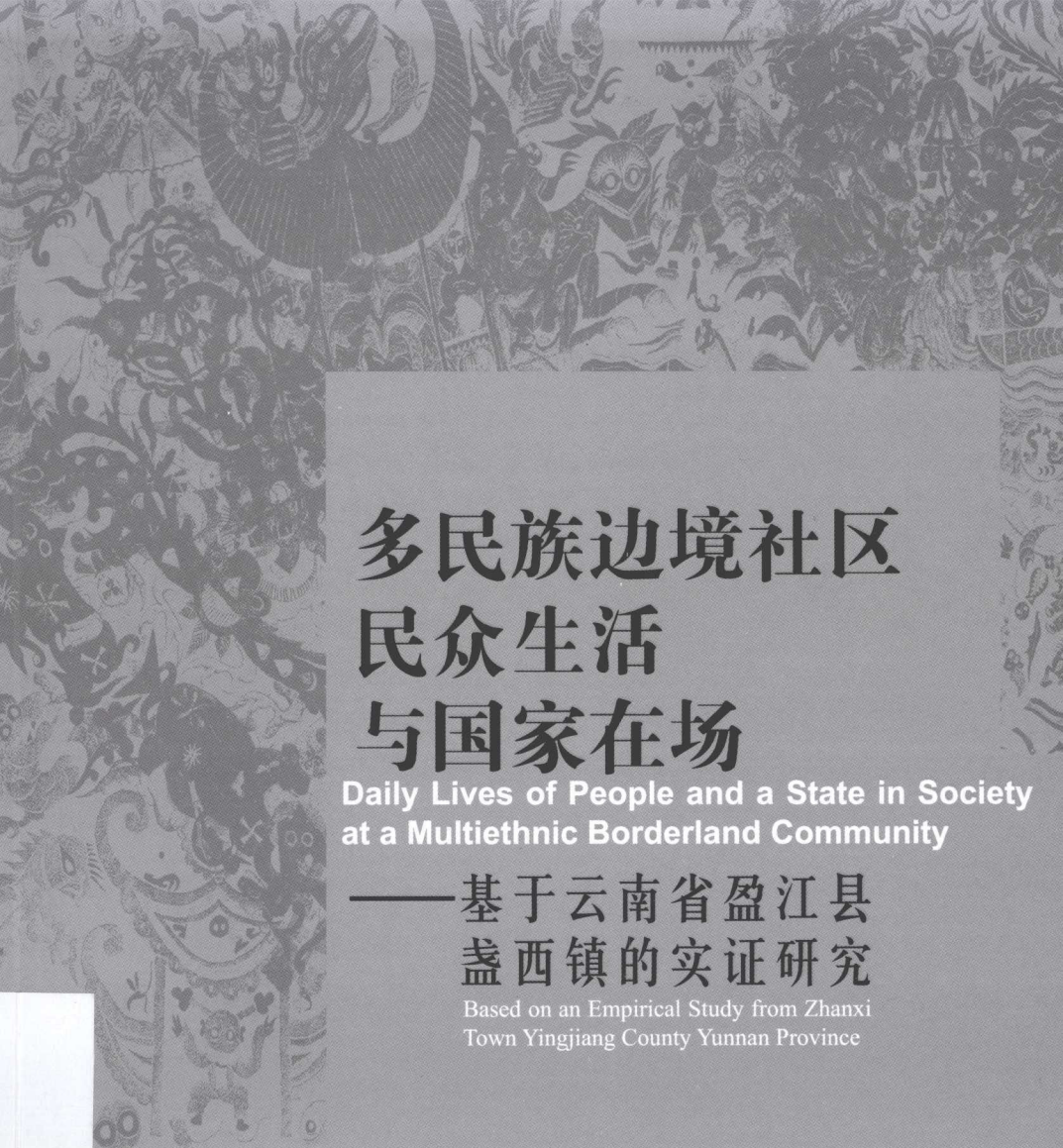




多民族边境社区 民众生活 与国家在场

Daily Lives of People and a State in Society
at a Multiethnic Borderland Community

——基于云南省盈江县
盏西镇的实证研究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Zhanxi
Town Yingjia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李树燕 著

出版社

多民族边境社区

民众生活

与国家在场

常州大学
藏

Daily Life of People and a State in Society
at a Multiethnic Borderland Community

——基于云南省盈江县
盏西镇的实证研究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Zhanxi
Town Yingjia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李树燕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多民族边境社区民众生活与国家在场：基于
云南省盈江县盏西镇的实证研究 / 李树燕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 - 7 - 105 - 12525 - 8

I. ①多… II. ①李… III. ①少数民族—
社区管理—研究—盈江县 IV. ①D66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8013 号

策划编辑：张宏宏

责任编辑：向 征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250 千字

印 张：9.125

定 价：2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525 - 8/D · 2474 (汉 35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 -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序一

“族际”的研究视角与多民族的边境社区

——为李树燕博士大著写的小序

周 星

李树燕博士几年前曾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和日本爱知大学联合培养“双博士”学位计划的受益者，来到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留学一年，正好我在该中心担任相关的博士课程指导教授，虽然她在爱知大学的博士论文应该是由松冈正子教授指导的，但她选修了我讲授的中国文化人类学课程，在课堂上积极参与讨论，也算是在学问上和我有了一点师生的缘分。现在，她的学术专著就要出版了，来函索序，我也非常乐意为她这部很有分量和价值的论著写几句话。在这里，我觉得需要声明一点：本书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而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由张金鹏教授指导的，因此，张教授为本书写的序言自然是会比我所能写的更为贴切、到位，对于全面理解本书的内涵也会更有帮助。我之所以还要再写一点，主要是想延伸作一些讨论，把我和李树燕博士曾经在 ICCS 的课堂上进行的学术对话再作一些深化。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中国民族学或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研究”，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族别”的研究范式，亦即按照 20 世纪 50—60 年代完成的“民族识别”工作所认定的“民族”来研究其历史、社会、文化和认同等。这样的“民族”经常成为一个给定的框架，并且越来越趋于硬化了。较为常见的

“族别”范式，诸如以“民族”为单位所编纂的《简史》、《简志》，以“族别”方式讲述的文化史、经济史和政治史，以“族别”方式描述的民族志和民俗志，以“族别”为单位建构学术体系和学会组织等等。“族别”研究范式的特点，在它走过头的时候，便是把这些给定的“民族”当作是一个大“箩筐”，不需要质疑，也不需要深思，直接就把各种社会文化事象拼命地朝里面填充，进而编纂大而全的民族文化史和民族文化志，所谓“民族是个筐，什么都朝里面放”；甚或是按照已经给定的“民族”来分类、切割文化，建构认同意识乃是血统的分野，并出现了将族际边界固定化、永久化的问题，极端时多少还有可能出现通过对它的人为划定来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倾向。由于一直以来缺乏反思和校正，这个学术研究的范式至少部分地逐渐偏离了学术的轨道，以至于出现了匪夷所思的族际竞争：把现存“民族”的历史上溯到史前时代，一定要比周边其他民族更为悠久，争夺某些文化的原初发明权，争论历史上某些政权的族属，把某些族际文化现象说成是我族独特的，把原本地域性的文化、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相互涵化的文化，解说成为“某族”纯净的甚或是具有排他性的文化等等。就是说，这样的“族别”范式很容易走向本质主义、孤立主义，也很容易走火入魔地迈向追求族群血统及文化的正统性、纯粹性，潜在着发展成为排他性民族研究的危险性。类似这样，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成为56个“民族”分别孤立发展的历史，而多民族地区则被简化成为“民族地区”，复杂的区域经济也被说成“民族经济”，越境的、为多民族的人民所族际共享的文化事象经常被熟视无睹，假如它们不能构成“民族”的特点，如果不能用其来论述“民族”的“原生态”，优越感及其天然的精神气质，似乎那些文化事象就是不重要或没有意义的。应该说，如此过头的“族别”研究范式，屏蔽了对多民族国家当中多民族地方族际社会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的可能

性，由于无视多民族的中国社会中大面积和大规模的族际文化交流与普遍存在的相互涵化的基本事实，在我看来，眼下一部分的“民族研究”确有走向偏颇、脱离真理和真相乃至建构偏见的倾向性。

不言而喻，“族别”研究范式曾经有助于揭示各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历史，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贡献不被承认的时代或背景之下，“族别”意识和“族别”研究范式以及由此建构和形塑的“族别”史、“族别”的文化表述、“族别”的民族志和民俗志等，还是有很重要的建设性，因为它对于解构正统、单一和王朝中心的历史观、文化观和民族观等，并使之相对化而作出了颇为巨大的贡献。不过，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和长历史的国度里，历史并非只是 56 个“族别”民族史的简单并置，并不是有 56 条单独的线索均必须或均有可能分别追溯到远古或史前。如何描述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如何理解多民族中国社会里普遍存在着的“族际文化共享”这一基本的事实，如何看待非常丰富的越境、跨界的族际文化现象，如何才能进一步揭示或澄清由费孝通教授提示的“多元一体”格局，并在更多的细部层面使其具体化，所有这些“族别”研究范式所无力、无法或无能完成的，甚或也是它不感兴趣的。

正是基于对“族别”研究范式之局限性的认知，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鼓吹”民族研究应该重视“族际”视角，希望新的“族际”研究范式能够逐渐地得以确立。我以为，只有努力实现朝向“族际”研究范式的转型或升华，进一步用“族际”研究范式对现存的“族别”研究范式进行补强的基础上，中国的民族研究才有可能克服而不是制造偏见、促成沟通而不是强化壁垒，进而也才能通过对多民族中国社会里族群与文化的多样性特点，以及对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中国各个多民族地区里丰厚的族际文化共享事象，对实际上大面

积存在并正在迅速成长的“国民文化”等有更为深切的了解。在我看来，如此的民族研究或相关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也才能够真正地造福中国各族人民。

李树燕博士的这部专著，集中地研究了云南省一个以多民族性、边境性和乡镇性为特点的基层“多民族边境社区”，她的此种界定和我以前提出的“地方族际社会”的概念颇有相通之处。在本书所描述的这个多民族的边境社区里，有傣族、景颇族、傈僳族、阿昌族、德昂族、回族和汉族等多民族生活其中，他们的分布大体上符合在云南省内颇为常见的“垂直立体”性格局，例如，傈僳族和景颇族多居住在山区；傣族多居住在坝区近水之处；汉族或在山区、半山区和景颇族、傈僳族杂居，或在坝区集镇较为集中。这些民族从微观的村寨层面上看，既有相对明确的“族居”倾向，又有非常突出的大杂居和普遍散居的情形，彼此间的地理边际模糊，普遍互相渗入，往往一个村寨之内也常有两个以上民族混居的状态；在一个村寨是“多数民族”，但在邻村就可能成为“少数民族”。在这里，若想以“民族”为单位来绝对地划定居住区域，其实颇有危险。大体上，这些民族既有各自族群单位的村寨生活，又有经由集市贸易、通婚圈、学校教育、行政建制等多种路径所建构的“族际”社会生活；在这样的基层多民族边境社区里，各族群既有各自文化和心理上的边际以及由此促成的民族认同，但也在相互的族际交往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采借、影响和融汇中形成了某些地域性共享的生活文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还在“国家”这一框架之内共享着越来越多的国民文化。包括当地的坐商、外来的行商在内，当地的集镇可以说是最为亲切的族际公共空间，各个族群的人们定期在这里互通有无，采用汉语和多种民族语言或其支系方言进行跨族群的交流，在相互的参照中确认各自的认同。围绕着集市而形成的族际公共空间，既有为认同和族群边际提供了场景性或情景性的一

面，又有促进族际交流，促使人们超越族群边际而相互欣赏，进而相互接受融汇的一面。显然，要理解如此的“多民族边境社区”，描述其社会及文化生活的全貌，“族别”的视角和思路既是必要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者需要在以“族别”视角审视问题的同时或在其基础之上，进一步拥有“族际”视野，并采用“族际”研究范式，才有可能更加真切和准确地接近于描述和理解它。李树燕博士的本项研究，因为既有“族别”描述，又有“族际”视野，尤其是她对对象社区内各族民众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多民族边境地方社会之各种情形的详细描述与分析，在我看来，堪称是有创新的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把本书作者对“多民族边境社区”的深入研究，视为是中国社区研究的新发展。早年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领域里兴起的“社区”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之一，无数前辈学者们对中国各地区、各族群的各种类型社区的研究也已经积累了大量详实的案例，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认知。虽然对于通过微观社区的研究是否有可能接近于了解中国社会的全貌存在着诸多质疑，费孝通那一辈学者多倾向于相信如果能够穷尽所有类型的微型社区，那么，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总体认知自然就会获得质的提升。然而，一涉及到“民族地区”、“民族问题”或“民族关系”时，就总是“族别”范式占据上风，“族际”的角度被忽视，于是，对单一少数民族村寨的社区研究近些年来确实有了较大的积累和成长，并由它们构成了中国民族志叙述的基本格式。有鉴于此，从“族际”或多民族的视角出发，开展对“多民族边境社区”这一类型社区形态的深入探讨，正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认为，作者对“多民族边境社区”的调查研究，不仅是对“族际”研究范式的学术实践，也是对社区研究的最新贡献。

20 世纪 30—40 年代，吴文藻等学者曾力主开拓“边政学”。在那个时代，中国作为新生的国民国家（多民族国家）正因为内忧外患而风雨飘摇，于是，强化对边疆政治的研究自然就有很多重大的现实意义。如今，边政学在台湾和内地均有传承，在内地还发展出“民族政治学”的新思路，但它们大多是在全国整体的层面上进行宏观勾勒，并容易陷入“中心—边陲”的模式之中，截至目前，对于中国社会之基层“多民族边境社区”的政治生活所进行的微观实证性研究仍非常少见。本书不仅关注基层“多民族边境社区”的政治生活，还尤其关注该社区内各族民众共同经营的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等。通过本书的描述，证明上述各个侧面均对“多民族边境社区”的政治生活，当然也对“民族关系”等发挥着多重复杂的影响。虽然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作者在云南这个基层的“多民族边境社区”的日常生活里“发现”了国家的“在场”，这依然有许多值得评价的学术意义。以往众多对少数民族社群或社区生活的描述，尤其是以“族别”范式描述其文化时，经常倾向于把它说成是均质的、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的以及和周边其他社群是明显甚或根本不同的，倾向于把相邻的不同族群——即便他们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社区之内，仍视为是泾渭分明、基本上对峙的。即便如此的理解不无意义，但在我看来，意识到下面这一点，则有着同等乃至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存在着众多的“地方族际社会”或基层有无数的“多民族边境社区”，而国家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其社会生活中出场或存在，它不仅促成或直接搭建出地域性共同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也不断地推动着得以为各族群所共享之国民文化的持续壮大与发展。本书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云南省一个“多民族边境社区”里国家“在场”的种种情形，它或明或暗、若隐若现，或直接或间接，或主动介入或被动地被利用，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国家属性的各种

仪式符号进入到社区内各族群的多种传统的节庆典礼之中，官方的主旋律话语被纳入社区宗教生活的宗教性说教之中等等。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受雇于国家，亦即所谓政府人类学家或政府社会学家，这种身份使得他们常常无法去思考国家“在场”的意义，由于无法把国家视为研究的客体化对象，自然也就无法提出相应的批评和质疑。由此而言，检视“多民族边境社区”中国家的“在场”，把国家或其在基层的代表亦即地方政府的施政也纳入学术研究的对象范畴之中予以考量，其意义自不待言。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科学中出现了重视“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研究思路，在我看来，若把“国家与社会”作为分析框架用来讨论中国的多民族地区或与少数民族相关的问题时，还需要由此延伸出“国家与少数民族社会”以及“国家与地方族际社会”（或如本书所说的“多民族边境社区”）的关系。只有这样，“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思路才有可能更加具体、细化和贴切。

谈到中国的“边疆政治”、“民族问题”或“民族关系”，最常见的理解就是将它理解为“汉族”和“非汉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一般来说或宏观而论，并没有多大的问题，但却失之于过于简化和僵硬。例如，在中国各地的许多“地方族际社会”或如本书所研究的“多民族边境社区”里，汉族往往只是多民族社会里的诸多成员之一，固然是会存在汉族和某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也会存在不同的少数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场合，汉族甚至不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往往是由某个少数民族主导着“地方族际社会”的格局。例如，纳西族之于丽江盆地，傣族之于西双版纳；还有在本书描述的边境社区里，汉族和景颇族分别只占到总人口的22%，而傣族人口则占到48%。对于“民族问题”的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将国家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同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正如本书

描述、分析的“色蛮”事件（“色蛮”为傣族村寨的神圣空间，用于祭祀村寨守护神）所显示的那样，国家或其基层政府经常具有调解民族关系的职能。固然由于汉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多数主体性以及汉语文作为共同语或族际共享语言的地位等理由，有时候把国家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混同为“汉族”和“非汉民族”的关系，似乎也不无道理；但若是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立场出发，还是需要把它们清晰地加以区分为好，因为在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国社会的很多基层社区里实际展开或运行着的民族关系，并不是总能采用“汉”和“非汉”的简单二分法来予以解释的。

在本书作者引导读者们即将了解的这个“多民族边境社区”，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既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及其社群的自主性，同时又必须提供涉及交通、通信、电力、学校教育、医疗、电视、广播及大众媒体等公共服务，建构可以为各族社群所共享的国民文化、公共空间和协调机制。尤其是在边境地方族际社会，国家会更加清晰地界定国界，宣导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强力主导边境地区多民族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维系各族群边民的国家认同，至少要努力不使其民族认同与应有的国家认同相冲突。国家既要承认边境多民族社会和内地相比较而现实存在的不平衡性，以及涉及环境和多种发展条件的独特性和滞后性，又不能容忍严重的族际贫困分化，因此，往往就会采取开发支柱产业（如甘蔗种植和其他经济作物）、扶贫移民工程等多种对策，尝试弱化“边陲”和“中心”的距离感，强化边疆和内地的经济及各种联系。国家在“多民族边境社区”各种场景下的“在场”，还直接导致各族边民政治生活产生了多元、多重性。寨老头和寨老、村规民约、宗教事务的领袖、年龄阶梯组织的头人等少数民族传统的权威组织得以“温存”，其与村干部、与由国家支撑的基层末梢的政府行政体系之间，发生了密切而又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互相渗透、互相利用、互相依

托，构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活景观。李树燕博士在本书里详尽说明了这一“多民族边境社区”的种种特殊性，包括跨境民族的越境流动、虽说是民族内婚却构成国际通婚的现状，来自境外的宗教渗透，跨境犯罪（如毒品走私等）的存在等等，与此同时，她还把当地的村民自治、基层村委会的“海选”、村委会和上级政府之间签订的各种责任书以及地方政府着力展开的救灾、禁毒、防止艾滋病等施政实践，均具体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通过深入、细致地观察各族边民的日常生活，本书生动揭示了中国一个“多民族边境社区”的政治生活实践的地方性特色，展示了在国家主导下各族边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生活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边疆政治乃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多元变通，如何处理好尊重“多元”和维系“一体”的均衡关系，乃是中国“边政”的核心命题。

以上是我拜读李树燕博士这部学术著述时的一些感想，其中有些观点曾经在我们的课堂讨论里有所涉及，现在我把它写下来，权以为序，既为延伸我们之间的交流，也作为对作者大著得以出版的祝贺。

2012年6月1日

写毕于爱知大学名古屋校舍

序二

作为李树燕博士的导师，我们已有六年的师生之缘。李树燕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既有六年的社会学专业素养，又有长期从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的实践，并多次深入云南边疆贫困山区作田野调查，熟悉边疆民众生产生活，具有严谨的科研态度，扎实的田野功底，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专著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深化而成的，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李树燕博士以多民族聚居的云南边境社区盈江县盏西镇为个案，通过大量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以“国家在场”的理论视角，从边民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宗教生活四个方面，探讨国家权力网络背后的深层结构和权力技术下沉的微观路径，较为生动地勾勒出边疆民族地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场景。特别是通过国家在场治理技术分析云南多民族边境社区民众生活的变迁，在这一研究中，一方面，重申了被很多学者忽视了的“符号治理技术”的隐性实践；另一方面，把经济技术、政治技术、文化技术与符号技术放入了一个动态实践中考查，突破了经济第一性的观点，从一种新的视角探讨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其二，把“国家在场”的学术概念，运用到社会研究领域

内，将“国家一边疆研究路线”拓展为“国家一边疆民众研究路径”，从边民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汲取素材，走出了“只见国家、社会，不见个人（民众）”的传统思维模式，从而具有一定的新意和学术参考价值，对“国家在场”这一概念及其运用，产生一定的示范推介作用。

其三，较充分地运用“国家在场”的理论工具，结合实地调查所得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以最新的实证调研资料呈现了边境民众生活的变迁现状，探讨了多民族边境社区民众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和内在功能，并从中得出一系列较为中肯、客观、符合实际的研究结论，为当地政府提供了治理多民族边境地区的理论与实证参考，为更好的维护边境稳定、民族团结、民众安居乐业、加快多民族边境地区更好更快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作为李树燕博士的导师、长辈、同行，我非常高兴她在该领域取得的成绩，希望她继续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学以致用，为社会做出应有的价值，取得更大的成就。

张金鹏

2012年7月于昆明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选题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设计	5
第二章 研究理论述评	12
第一节 国外学者有关国家与社会的观点回顾	12
第二节 市民社会观	24
第三节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阐述	29
第四节 国家与边疆社会观	35
第五节 国家在场文献梳理	40
第六节 国家在场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43
第七节 国家在场分析框架的建构	48
第三章 云南省盈江县盏西镇多民族边境 社区与民众生活概况	53
第一节 德宏州与盈江县概况	54
第二节 盏西镇概况	55
第三节 盏西镇各行政村概况	61
第四节 盏西镇多民族边境社区各民族生活概况	76

第四章 多民族边境社区民众经济生活与国家在场	92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两种视角：	
国家中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92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两个层面与四个维度	94
第三节 多民族边境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94
第四节 政府主导民族产业结构调整	100
第五节 国家主导：多民族边境社区不可	
或缺的发展模式	115
第六节 研究中的发现	116
第七节 总结与启示	119
第五章 多民族边境社区民众政治生活与国家在场	124
第一节 具有代表性的权力模式理论	125
第二节 国家在多民族边境社区权力	
运作的历史变迁	126
第三节 国家在多民族边境社区的权力组织	130
第四节 《责任书》：国家权力深入基层	
政权的路径	143
第五节 “乡规民约”的变迁与建构：	
国家权力深入个体民众的路径	152
第六节 国家在多民族边境社区治理的行政路径	157
第七节 个案分析	162
第八节 总结与启示	175
第六章 多民族边境社区民众文化生活与国家在场	178
第一节 文化内涵与民众文化生活	178
第二节 中国文化权力的渊源	180

目 录

第三节 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构·····	181
第四节 个案分析：“色蛮的变迁”·····	197
第五节 总结与启示·····	200
第七章 多民族边境社区民众宗教生活与国家在场·····	204
第一节 宗教社会学的主要思想及相关概念解释·····	204
第二节 国家意识形态对民众日常宗教生活的影响·····	208
第三节 民众日常宗教生活的变迁·····	223
第四节 国家语境中的民间仪式：“玉佛寺 宝鼎当体庆祝典礼”个案分析·····	227
第五节 总结与启示·····	236
第八章 结论篇·····	238
第一节 国家在场治理技术讨论·····	238
第二节 研究总结·····	250
主要参考文献·····	255
后 记·····	272